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

□ 金冲及

战略思维能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战略头脑），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它首先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和敏锐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一向要求：“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个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有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的观念，并且弄清那些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有些事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那就得坚决顶住，不能去做。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十分看重。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有把握地走好每一步棋。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全局形势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工作时，总是首先把力气用在观察和判断全局上，特别是敏锐地察觉出哪些是对全局发展变化有重要影响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读读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他经常先这样分析：现在局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和以往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发展的前途如何，因此我们的方针应当相应

地作怎样的调整。这里，可以以解放战争为例：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这年年底毛泽东同志就对政治、军事、经济三个方面的实际状况作了仔细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全局性的结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这是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很明朗的地方，还存在不少容易使人感到迷惑的次要因素，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毛泽东同志经过敏锐而审慎的观察和思考，不失时机地作出这个判断。有了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些重大问题便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上来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经济纲领、政治纲领也到了要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的时候了。

再如，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只隔了10来天，毛泽东同志就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当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

打倒了。”全国解放战争便以这个全局性的判断为依据，以新的姿态新的部署，加快步伐地展开了。

一名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果没有这种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当机立断，正确决策，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而是被动地忙于应付枝枝节节的部分性事务，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甚至会坐失良机 and 发生失误。

预见性同全局性眼光分不开，要求指挥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能够分辨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并且能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品质。他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高手下棋，谁能比对方多看几步，谁就可能取胜。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中总是想得很远。他不是只忙碌地应付摆在眼前的种种具体问题，同时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动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当抗日战争正处在紧张关头的时候，他已开始考虑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应该是怎样的，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这种设想就越来越清晰具体。当历史巨大变化来临的时候，无论1949年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宪法的诞生，都不是仓促草

朱德：绝对不能铺张浪费

□ 郑林华

崇尚简朴是朱德的美德之一。朱德一生和旧势力、旧观念作斗争，为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谋解放，一生中过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

保健医生顾英奇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朱德时的情景，只见朱德贴身穿的是一套浅蓝色丝绸面的丝棉袄裤，袄裤面已完全破烂，补丁挨着补丁，不知穿了多少年，一直舍不得丢弃。外边罩一套制服，照样年年穿它过冬。一直到1960年以后，这套棉衣实在无法再补了，才换了一套新的。

朱德还有一双穿了多年的老式棕色皮凉鞋，颜色已褪落得斑驳不匀，但他也总是不肯换新

的。他每年夏天叫卫士给拿这双鞋时，风趣地说：“拿草鞋来。”大家就都知道他要的是这双凉鞋。直到1965年顾英奇离开时，这双鞋还在伴随他老人家属度夏。

1956年的一天，朱德要卫士拿一套灰色哗叽料中山装，卫士不情愿地说：“那套衣服两只袖子已经磨得破烂不堪，不能再穿了。”朱德却坚持要穿：“补一补，还可以再穿嘛！”衣服补好后，他很满意，高兴地说：“衣服不怕它破，破了可以补上，洗得干净，这样穿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外国人看了都好啊！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带头艰苦朴素，做出榜样。”

那些年，工作人员为了朱德

的健康，总想给他改善一下伙食，以保证营养。厨师邓林为此想了不少办法。而朱德为了这件事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话。

有一次，朱德笑着问：“邓师傅是不是资本家呀？”

邓师傅红着脸赶紧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呵！”

朱德依然和蔼地说：“不是资本家，怎么那样闹气呀？不要天天都成席席，要吃家常便饭。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农民，也是吃粗粮、小青菜长大的，身体也很健康。我不让你每天做大鱼大肉，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

在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对自

己的生活要求更严了，减少了粮食定量，一般不吃肉食，并反复对大家讲：“现在国家经济困难，人民生活艰苦，我们要想到全国人民，要同他们同甘共苦，节约一点是一点，绝对不能铺张浪费。”朱德真正做到了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共渡难关。

（摘自2017年第20期《新湘评论》，原标题为《朱德 谨守寒素朴实》）



况，不在决定政策”，“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明显受到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影响和启发。毛泽东曾经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但是，陈云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他在财经工作上的调查研究，具有独到的特点和贡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夸奖陈云懂经济工作，“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摘自2020年6月29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



在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马院村闽中游击区革命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个破旧的箩筐。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箩筐，却和当年一部电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战争年代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群众深厚感情的见证。

现年八十岁的杨国梁，是土生土长的马院村人，他的母亲林阿秋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林阿秋（1920年—2015年），马院村一位普通的村民，如果不是八十多年前的那次挺身而出，或许她的名字无人知晓。作为革命后人的杨国梁，忆往昔峥嵘岁月，依旧难掩激动之情。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少数红军、游击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至1936年8月间，中共闽中特委领导的一支闽中游击队，在以常太为中心的莆仙崇山峻岭中开创出一块独立的游击区。游击队由地方党组织自主领导，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奋战。

国民党为了遏制闽中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把第四十九团从福清调到莆田来“清剿”，并采取了“三光政策”。敌军的残忍激起了村民的义愤，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与游击队员团结一心，有的替茅藏伤员，有的节省粮食支援游击队。

隐藏在深山老林的游击队急需一部电台与外界联系，以便更加准确地打击敌人。远在城里的地下党组织有一部电台，此时，必须有人员翻山越岭进城取回电台。可是，常太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已被敌人封锁，人员进出需要严密盘查，游击队员出村很容易被敌人认出。如何取回电台？游击队员们心急如焚。

看到游击队员们愁眉不展，不到二十岁的村民林阿秋自告奋勇。第二天天不亮，林阿秋和叔公两人就起床了，扛着扁担，挑着箩筐，乔装成走亲戚的模样，按照游击队提供的路线，一路疾行。到联络点时，已是下午时分。联络员将沉甸甸的电台交给林阿秋和叔公，嘱咐他们一定要将电台交到游击队手中。

为谨慎起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无线电台的零部件拆分，分别置于各自的箩筐底部，上面盖上一包包食盐，伪装成乡亲们委托他们买盐的样子。临近天黑，二人才动身，准备趁着夜色返回马院。

本以为天色已晚，敌人的防备会松懈，可是当他们走到常太境内的熨斗路段时，远远望向敌人的哨点，发现敌人盘查似乎比以往更严，他们不但掀翻了村民的担子，还用枪托敲碎一切可疑物品。如何通过敌人的封

（上接1版）

推动武警部队紧紧跟上国家和军队法治建设步伐，必须强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面对表、一体执行军委颁发的条条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依法履行使命、推动建设，尤其要坚决纠治过去那些地方化、特殊化、分散化的思维惯性，引导广大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党委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严起，举一反三全面检视归治，靶向治疗解决突出问题，切实归正工作重心，为基层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谋打仗、抓落实。必须持续纯洁部队政治生态，善于运用法治手段正风反腐，把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责任和压力，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努力实现风清气正。

体悟担当之责，在勇于自我革命中砥砺前行

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深切感到“斗争”“革命”“担当”“责任”，是贯穿各个专题的高频词。第三卷最后一个专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9篇文章，从中可以看

一部凝聚党群深情的电台

□ 吴震 宋雅炜

锁，将电台平安地交给游击队？林阿秋和叔公商量，决定等天完全黑后，绕过这条唯一的村道，从人迹罕至的山路爬过去。

常太的山，崎岖不平，林木茂盛，杂草丛生，林间还有数不清的毒蛇虫蚁。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只能一路摸黑前行。一直到次日清晨，二人终于到达游击队的据点，将无线电台安全送达马院村，交到游击队员手中。而此时，两人的脸上、手上、脚上被划出了数道伤口，鲜血浸透了旧衣服，却浑然不觉。

“母亲告诉我，把电台完好无损地交给组织是当时唯一的念头。”杨国梁说。

这部电台，为闽中工农游击队与外界连上了“永不消逝的电波”。闽中游击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克服艰难险阻，与敌周旋，粉碎敌人的“清剿”，保存了游击武装力量，巩固了游击根据地。而后，林阿秋和她的叔公又积极投身革命，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开了一家小店，给游击队员打掩护。

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中党组织率领游击队先后开辟了以常太外坑、滦川、金竹坑为中心的莆仙边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域从莆田一直影响扩大到仙游、永泰、闽侯、惠安等县，成为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之一。

（摘自2019年3月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出习近平主席关于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历史自觉，同时也内含着对形势剧变、使命倒逼的深切忧患。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锻造“四铁”过硬部队，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有铁一般的担当。当前，强国强军事业正处在攻坚克难、闯关夺隘、“开顶风船”的特殊时期，处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处。我们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随时接受组织的考验、战场的考验、事业的考验。必须确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用人导向，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的要求，及时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矢志打赢、献身强军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为担当者担当，为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撑腰鼓劲。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基层打基础，确保既完成任务出色、又全面建设过硬。必须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既挂帅又出征，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尤其要盯住备战打仗、规划攻坚、改革落地、巡视问题整改、历史遗留问题破解等重点难点，创新进取、苦干实干，以站在排头、砥柱中流的状态姿态，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奋力开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新局面。

陈云与调查研究

□ 曹应旺

自1956年11月起，陈云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的同时，还开始兼任商业部部长和中共商业部党组书记。1957年1月9日，他在商业部党组会上讲话时，谈论了调查研究弄清情况与决定政策的关系。陈云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调查研究弄清情况，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

陈云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是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为能给全党的组织建设制定出有效的方针政策，陈云先后共组织了9个乡的支部书记进行调查研究。在做边区财经工作时，他也经常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接收沈阳时，他先后四次到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期间，1949年七八月间的上海调查、1951年3月的武汉调查、1955年1月和5月的青浦调查、1961年上半年的化肥工业调查以及下半年的青浦小蒸调查和北京煤炭工业调查等，都留下了许多佳话。

陈云提出的“难者在弄清情